

中醫文獻學

薛凤奎主編



中醫文獻學

主 编——薛凤奎

副主编——赵立勋 王永谦

编者——于鸿玲 王大淳 王永谦

王晓萍 冉 再 邓家刚 许敬生

吴文刚 肖广义 陈竹友 赵立勋

高光震 徐 麟 傅锡钦 薛凤奎

(以姓氏笔划为序)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180653

编审小组名单（除正副主编单位外，其余按学院首字笔划为序）

辽宁中医学院	刘忠德	刘鹏举	陆云平	马 骥
成都中医学院	曾成厚	郑孝昌	向质彬	
广西中医学院	黄瑾明	河南中医学院	郑建民	
长春中医学院	段成功	湖北中医学院	张六通	
甘肃中医学院	张正昭	黑龙江中医学院	郭有昌	
安徽中医学院	汪 涛	福建中医学院	范德荣	
河北中医学院	杨牧祥			

263/23

中 医 文 献 学

薛凤奎 主编

责任编辑：黄一九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2.5 插页：1 字数：314,000

印数：1——10,100

ISBN7—5357—0469—7

R·101 定价：4.10 元

湘科88—17

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医学术的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专门机构,领导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的工作,使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步入了建国以来新的开拓时期。由于形势所需,有关研究中医文献的理论,就成为了中医工作者,尤其是中医教学科研人员的必备知识。目前,中医文献学已经成为中医学术中一科专门的学问。

与此同时,有的院校开始设立中医文献专业,多数院校相继增设了中医文献学课程,但尚无一本专门的中医文献学教材。为此,辽宁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长春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黑龙江中医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的中医文献学主讲教师(姓名署于每章节后),根据国家教委关于编写教材的规定,在国家中医管理局教育司领导的关怀下,在上述十一所院校领导直接支持下,发起协编了中医专业第一部《中医文献学》教材。

在突出教材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文献学的知识系统,结合中医学术的独自特点,全体编委和部分编审委员在沈阳、成都两次召开会议,反复切磋,认真推敲,确定了本教材的体例,并完成了初稿的修改工作。

《中医文献学》在中医专业课中,是乍开新径,难得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进修班等不同层次的教材。有鉴于此,以不失教材特点要求为首务,我们把教材分为上下两编,以适应不同层次教学的需要。

《中医文献学》作为教材,有不同于目前已出版的文献书籍之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中医文献学》是目前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医文献理论的专著。目前已出版的同类书,或谈科研方法,或为论文集,或为检索,皆为中医文献范畴内的专题论著,而无一书是专门阐述中医文献学知识系统的。本教材则从中医文献的概念论起,全面系统地说明了中医文献的知识范畴,规范了中医文献学的知识体系。

2.体现了中医学术体系的个性。《中医文献学》借鉴一般文献学的理论,但不受其束缚,而是结合中医专科学术自身发展的特点,重点突出中医文献的个性。如中医文献概念、文献分类、目录编排特点等,皆具个性,一看便知是中医文献,不能鱼目。

3.全而不杂。本教材的内容虽然概括了中医文献学的知识系统,但全而不杂。全书共十二章加一附录,仅三十余万字,力求在符合教材科学性、系统性的基础上,体现“精”字。

4.普及与提高兼顾。本教材上编重在介绍中医文献学的基础知识,供本科生使用;下编讲中医文献的研究内容及方法,重在科研,供研究生、师资班使用。

从整个内容看来,本教材既有中医文献产生源流、目录、版本、校勘等系统基础知识,又有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方法,而且每章后都附有复习题,参考文献书目,便于自学,所以适合广大中医工作者学习使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院教务处长的支持;辽宁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忠德、主编单位辽宁中医

学院院长刘鹏举、教务长陆云平。副主编单位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明富、副院长万德光从始至终给予热情关怀。郑寿昌教授、高光震副研究员、王大淳副研究员参加了统定稿工作；安徽中医学院徐麟讲师为中医文献训释一章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以及有关文献学作者的大作，为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中医文献学》是分科性文献学教材，在综合性文献学知识系统的哺育下，撰写分科文献专著，尚属尝试性工作，加之编者知识有限，阅历不广，失误谬见之处，实难避免，诚望识者指教，以期改正提高，编者不胜感激。

《中医文献学》编委会

1987年12月于辽宁中医学院

目 录

上编 中医文献学基础

绪 言

第一章 中医文献的源流……………(3)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产生……………(3)

第二节 古文物与中医文献……………(7)

第三节 甲骨文的医用文献价值……………(9)

第四节 中医文献的发展……………(11)

第二章 中医文献的体式……………(15)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书籍制度……………(15)

第二节 中医文献的体例……………(23)

第三节 中医文献的文体……………(27)

第三章 中医文献的分类……………(31)

第一节 中医文献分类的沿革……………(31)

第二节 古书部类与中医文献……………(37)

第四章 中医文献的目录……………(42)

第一节 目录学概述……………(42)

第二节 目录的基本结构……………(46)

第三节 中医目录的编排特点……………(48)

第四节 常见中医的目录书……………(50)

第五节 非目录书中的中医文献……………(55)

第五章 中医文献的版本……………(57)

第一节 版本概述……………(57)

第二节 版本类型……………(61)

第三节 版本术语……………(63)

第四节 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64)

第五节 宋元明清版本特点……………(66)

第六节 版本源流研究与系统归纳……………(67)

第六章 中医文献的校勘……………(76)

第一节 校勘概述……………(76)

第二节 古医籍中常见错误及其表述术语……………(82)

第三节 校勘的程序和方法……………(85)

第四节 校勘注意事项……………(96)

第七章 中医文献的辑佚与辨伪……………(100)

第一节 辑佚的概念和意义……………(100)

第二节 辨伪……………(105)

下编 中医文献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第八章 中医文献的句读……………(111)

第一节 句读概述……………(111)

第二节 中医古籍常见的句读符号……………(115)

第三节 与句读相关联的符号……………(117)

第四节 句读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运用……………(121)

第九章 中医文献的训释……………(127)

第一节 中医文献训释概述……………(127)

第二节 中医文献训释的方法与内容……………(134)

第三节 中医文献训释的体例和形式……………(138)

第四节 中医文献训释的注意事项……………(141)

第十章 中医文献的语译……………(146)

第一节 中医文献语译概述……………(146)

第二节 中医文献语译的基本方法……………(148)

第三节 中医文献语译的具体步骤……………(151)

第四节 中医文献语译的注意事项……………(154)

第十一章 医古文知识在中医文献研究中

的运用……………(160)

第一节 文字学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运用……………(160)

第二节 词汇学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运用……………(161)

第三节 运用语法知识辨析章句……………(163)

第四节 音韵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作用……………(164)

第五节 修辞学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作用……………(167)

第十二章 中医文献研究的课题与论文写作……………(170)

第一节 中医文献研究的课题……………(170)

第二节 文献资料的积累……………(172)

第三节 论文的选题和撰写……………(176)

附录 工具书的使用和中医古籍中常见问题的查找……………(183)

绪 言

一、文献与中医文献

文献一词的准确概念，目前尚无定说。但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则是肯定的，统一的。即文献是有一定价值的文字资料，它必须是具有某种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的，有某种载体的知识记录。

中医文献是科技文献，本教材所言中医文献，不包括现代文献，是指清以前的古代文献而言。

中医文献源于人类生活的开始，源于人类卫生保健的实践，是人类科技文化、医药卫生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中医文献的内涵应该包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中医图书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有文字记载，有载体形式的文物资料。

学习和研究中医文献必须注意中医文献的以下几个特点：

1. 中医文献的主要载体是图书。大体可分四类：一是经书、专著和对经书、专著进行注释析义的书籍；二是据经书、专著而衍成的临床各科的文献；三是史志中所载的医药记事；四是散见于历代诸子著作中的单篇论文。

2. 中医文献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沿用性、今用性的特点。中医文献虽属科学技术文献的范畴，但它与一般的科学技术的古代文献不同。一般的古代的科学文献只具有一定的可贵参阅的历史性，而无现时的实践性、可用性。中医文献则由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决定，对现时的医疗实践与科研内容仍然具有指导和应用的作用，因而中医文献的沿用性、今用性的现实意义特别突出。

3. 中医的早期文献具有极强的探微溯源作用。中医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它本身就是在不断充实、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中医的早期文献对于探讨确定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源始过程就自然地具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4. 中医文献与没有文字记载的文物关系密切。没有文字记载的出土文物不属于文献，但是中医文献的继承性、沿用性决定了文物在研究中医文献过程中，考证理论形成源流、著述成书时间、医家生平事迹诸方面的资料作用。

中医学是伴随人类生活的开始而产生发展的，因而反映着人类生活每一个历史时期特点的文物，对于研究人类医药卫生的发展，无疑都可起到指证作用。

5. 整理与发挥是研究中医文献的方向。鉴于中医文献的主要形式是图书，而且其今用性明显，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医文献研究自然就会成为中医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医文献的研究，就目前情势论，主要是整理和发挥。整理是指对中医文献的校勘、注释、整理再版，以传原貌；发挥是指在整理的基础上发扬、发展、升华中医文献流传沿用下来的理论，亦即今用内容突出的理论，发挥原文献宗旨，使其适应并促进中医学学术的发展。

中医理论体系中或阴阳、或五行，或脏腑，或精气，都有许多问题尚待探讨，而从事中

医文献研究正好可以发古人之思，引今人之见，为解决这些尚待研究统一的问题提供资料依据。如五行学说，春秋之前即有天体五星为五行源起之论，又有五府、六材之说，可提供作依据的文献有《汉书·天文志》、《史记·历书》、《山海经·南山经》、《左传》僖公16年、文公7年、昭公11年、《荀子·礼论》、《山海经·南山经》、《诗经·生民之什》、《尚书·甘誓》等，如果我们综合这些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就会对五行学说的起源、内容、医用的源始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此之例，内容颇多。中医理论体系中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升华的理论，都可以在中医文献研究中得到解决，或得到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二、中医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及其任务

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论述文献的内容和任务时说：“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一段论述，综合了目前文献工作者的认识，概括了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和任务。

中医文献与一般文献所不同的是，它的研究不仅是“替研究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而是其研究本身就是在起发展中医学术的作用。

依据这一结论分析，中医文献学的内容和任务可归纳为：

1. 探讨中医文献的产生及源流，为研究确定中医学的起源时间提供依据。
2. 探讨中医文献的种类、载体形式及其发展，为研究中医学术在各历史时期的发展提供依据。
3. 借鉴目录学知识，探讨中医文献目录学的特点及发展概况。
4. 研究中医文献的版本情况，探讨中医文献的版本系统，为中医图书的流传提供真实资料，从而使中医各家之说得到发展。
5. 阐述中医文献的校勘、辑佚、辨伪、训释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及其特点，为整理中医古籍，使之沿传奠定基础。
6. 介绍文字、音韵等学科知识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7. 介绍中医文献学的重要书目和工具书，说明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8. 介绍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医文献学的内容及任务，还会随着中医学术的发展，中医文献的自身发展而不断充实丰富。

上编

中医文献学基础

第一章 中医文献的源流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产生

一、中医文献释义

据目前可查阅的资料断定,“文献”一词的古代释义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注疏》郑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此释文为文章,贤指贤才。后世注家则认为贤才是“能以传述礼典的”人的言行。

自郑注以来,古人对“文献”一词的释义,究其实质,基本上是相同的。

文,指文章。在《礼记·礼运》记述孔子活动时也有明确的释意。原文如下: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意,《夏时》之筹,吾以是观之。”

《礼记》中的这段话,可以为《论语·八佾》作注。《夏时》是《大戴礼》的《夏小正》,《坤乾》是《易》《归藏》,二者皆为研究夏殷两代政史民俗的历史资料。“吾以是观之”,译意为用《夏时》、《坤乾》考察夏殷的历史。由是可知,孔子所谓“文献不足”之“文”,实指历史资料而言。

文,指史料。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文,典籍也”,已明言文是典章史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释“文”曰:“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简言之,“引古经史谓之文。”马氏《文献通考》分二十四门,其十八《经籍考》七十六卷,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说明了马氏的“文”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典章制度、历史资料,而是泛指刊刻流传的前贤著述图书了。

“献”,指贤才。《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传》云:“献,贤也。”段注《说文》云:“献得训贤者,《周礼》注‘献’读为‘仪’。”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在《文献释》中也训解说:“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此论已明确指出“献”就是人的言行。考诸马端临《文献通考》所云“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可见“献”的含义,即是可以传典章制度,可以述经典之论的人的言行,按古义所论,献,即是有关历代“贤”士言行的记载。

综上所述,“文献”一词发展至今,已不再分释。中医文献概念的今义应明确为:历代流传至今具有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的中医图书以及与图书相关联的人的言行的记载。其具体

内容应包括有版本的特点,版本的沿革,传本的派系,书目的记载,堂室的确定,历代的校勘,内容的价值,字词的研究,章句的析义;以及经典著述评论,作者生平,师承影响,学术渊源,著述考略,可资研究作者著述的传记及其他资料。

中医文献属科技文献范畴,应具有三个要素:一是有具体内容,具体的图书史料;二是具有使用价值、实践价值,可资重复考验;三是具有历史意义、历史地位,可作用于今。不具备这三要素者,不能称为中医文献。

中医文献与中医文献学不同,中医文献是指具有三要素的图书材料,而文献学则是把这些具体材料视为研究对象,并包涵着研究这些具体材料所必备的知认识及其应该掌握的研究方法,亦即包涵着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等学科的知识。

二、传说中的文献与中医文献的渊源

相传公元前21世纪,早在“三皇五帝”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著述。三皇,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他们所著之书叫“三坟”。五帝,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他们的论著叫“五典”。学者认为这“三坟五典”即是古文献产生的源头(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云:“王曰:是良吏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灵王赞倚相之辞。原注:“皆古书名”,“言此人能读此古书也”。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章炳麟释曰:“坟,丘十二,宜邵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亦言“坟”指经典巨著《三坟书》而言。《三坟书》分山坟、气坟、形坟,其中《连山》为伏羲作,《归藏》为神农作,《乾坤》是黄帝作,又各衍为六十四卦,并杂以《河图》。孔安国在《尚书》序中释“五典”曰:“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论解说:“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关于“三坟五典”之书存在与否,古人已有评论。宋·元丰七年即公元1081年,张商英自称得真本于民家,然所述内容,多为无稽。同代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断然否定是书,认为是张氏哗众伪造。与晁氏同为南宋人的陈振孙于《直斋书录解题》中,在指出此书是毛渐得于唐州民间的同时,也明言其为伪书。明代程荣把它刻入《汉魏丛书》,既有毛渐序,又有明记晋阮咸注,煞有杜伪之势,但自清以来,学者皆云程氏之刻是伪中之伪。

公元前21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史前时期”,即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要把自己的生活、见闻、知识、思想,传告给后人,只能依靠记忆性的语言,诸如歌咏、谚语、故事、口头文论教人强记,以备需要时背诵。人们以这种记忆语言,彼此相告,世代传播,便形成了今人所说的“传说”,或叫做口头的“书”。这种“传说”,到了有文字时代,就有人开始根据传播到彼时的传说内容追记前人之事,使之由口头的书,变成了由文字记载的书。由于传说的核心是古代人历代相传的内容,其中虽有追记者的附会,传播者的增衍,刊行者的想像,但毕竟会保留着远古时代的传说创造者们的初衷,也就是说毕竟还可寻觅出一点真实的价值。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虞夏以前”,当指三皇五帝时代,后人不睹遗文,但应承认歌咏文学是“生民”即初民始创的。依此而论,中医古籍中所记载的那些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思想缜密的文论,是出于后人的伪托,但也应当承认是他们所代表的生民的那个时代始创了我国的医学。

公元前四千年,我国历史由山顶洞人时代进入了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石器、骨器的种类繁多,制造精细,开始了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时代,奠定了产生古代文化传说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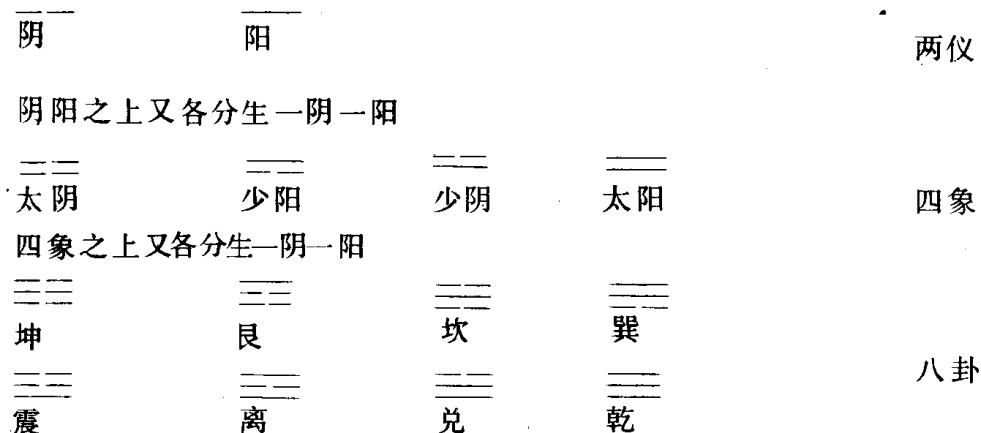
三皇五帝就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他们的《三坟》《五典》的传说内容是有其生活条件作为依据的。

《吕氏春秋·古乐》记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尚书·尧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葛天氏乃黄帝子裔，其民已有操牛尾载歌载舞之雅兴，尧帝之民也兴拊石作乐，仿兽姿作舞之风，可见彼时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都已日渐丰富，人们的形象思惟和抽象思维都有了相当发展，口传思想，言谈哲理自有可能。当此之时，产生《三坟》、《五典》之类的口头“书”，似可置信。

传说是在传中说、说中传，年代既久，遗漏增添，离原传内容已远，多半不能轻易相信。但是，正如上述，古代的传说，古代口头流传的、活的、不胫而走的“书”，确实是存在的，可以赖此追觅古代社会的史实，可以概称为流传的文献，是我国文献产生的源头。

传说的《三坟》、《五典》的内容，以及三皇五帝的其他遗文遗事，虽出于后人，但从这些传说的记载中，对于考察原始社会，考察原始文献，仍有其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勾勒出原始文献的轮廓。

传说的《三坟》、《五典》中的哲理内容，与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哲理基础渊源密切。三皇著述衍为六十四卦，其次序是按下列方式排列的：



八卦中每两卦重叠变生新的一卦，以此类推衍为六十四卦。

现据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保留的耶稣传教士鲍威特在中国获得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复制如下：

这种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式的阴阳互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认识与表达方法，与中医阴阳学说中的阴阳互根的理论实乃同一源头。伏羲六十四卦，虽然见于《周易》之后的记载，但确也保留了古人的原始认识。佐之以“伏羲氏……画八卦……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伏羲尝草制砭”，“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关于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就更增加了《三坟》、《五典》传说内容在研究中医理论起源问题上的文献意义。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等文献是我国古代文献由口传文献发展到文字记载，即书籍文献的基础，也是中医文献产生的思想基础。研究我国传说时代的原始文献，可以从中看出中医学起源的端绪，它的内容虽然有不可尽信处，但又确实是信史时代前的不可忽视、极可珍视的文献资料。

研究传说文献内容原始资料的主要参考书籍有：《帝王世纪》、《路史》、《史记·补三皇本纪》、《礼纬》、《淮南子》、《左传》、《尚书》、《山海经》、《太平御览》、《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逸周书》、《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检论·尚书故言》、《礼记·檀弓》、《礼记·乐记》、《战国史》。

三、中医文献产生的时期

从目前考古成果以及出土文物考定，沿三皇五帝时代传说文献的源头，伴随社会生产的发展，哲学文化的演进，医药技术的提高，到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就产生了有载体形式的，使今人可以稽查的中医文献。

我国最古的正规书籍，是写在竹简和木版上的，通名为简册、简书。这是目前能确定的中医文献的最早的载体形式，大约兴在殷周时期。所谓“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就是记载这一史实的。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又出现了帛书，在中医学史上与简册合称为简帛医籍。从殷周至战国时代的简帛医籍是中医文献在产生时期的主体文献材料。

综合考查我国出土的最早简帛书及其简帛医籍的内容，结合中医学术自身发展特点，可知中医文献产生时期，其文献资料大概有三种：

1. 中医文献的主体资料：中医文献的主体资料，或言主体内容，是指反映记载中医自身理论的简帛医籍。这是考察研究有纸书之前的中医理论发生发展的令人信服的珍贵资料。我们现在能够目见的这种资料来源有二：一是出土的简帛医籍；二是在《素问》、《灵枢》中保存的简帛医籍的条文。

2. 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资料：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资料，是指存在于先秦诸子著述中的论医文字。

由于简帛医籍难求，除《黄帝内经》之外，欲览先秦之前全面论述中医理论的书籍，现时尚无可能，因此散见于先秦诸子著述中的论医文字都是十分珍贵的中医文献资料。出土的简帛子书都是现传先秦子书的古本，可以补充现传本之未论，并佐证现传本已论之确。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中有一段原文是：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聾）。是以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这实际上谈的是恬淡少欲、精神内守、保正祛疾的道理。假如我们能够结合《黄帝内经》，及后代其他医家的论述，于养神扶正，防止未病之理，必有所得。

我们在学习《黄帝内经》，从事中医理论文献研究的时候，必须重视收集散见于先秦子书著作中的中医文献材料，籍以充实中医理论的有关论述。散见于先秦子书著述中的中医文献

资料，当然以难得少见的简帛书为贵，但是，秦汉以后流传下来了经史子集中的论述，亦属此列，不容忽视。

3. 地下发现的文物资料：文物是指对中医文献研究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遗物。

地下发现的文物文字资料是指甲骨文、金文、各种刻有文字和无文字的器物。这些文物文字资料对于早期的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西汉时代，文献研究者在从事文献研究工作中就开始使用文物文字资料了。西汉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经书抄本，时称古文经，有的学者便用来校正当时流传的今文经。现代学者郭沫若运用考古资料辨证了不少古籍的伪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这里我们重点谈谈无文字的器物。无文字的器物，虽然不属文献范畴，但对于考证研究文献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可作为判断传说时代文献内容的真伪，确定早期文献成书年代的佐证资料，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人遗骸和无文字的器物中，循用选拾，必有所获。

传说黄帝时代名医俞跗（或作俞拊、俞拊）善疗骨伤，为人治病“不以汤液醴灑，鑿石拊引，案扞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固五脏之腧，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史记·扁鹊苍公列传》）。这实际上是最早的外科手术疗法的记载。但是，自汉以来，许多人拗于《韩诗外传》“俞跗治病，不以汤药，搦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之语，以巫术论俞跗，而把这段传说的记载晒为不经。

考古出土的原始人骸，却证实了后人所传俞跗医术，摒弃夸大之词后的可信性。

距今五千余年，与俞跗的历史时期相当的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人骸中发现有头骨、齿弓人工变形和拨除侧门齿的完整骨架，这种有明显的头骨、齿弓人工变形，拨除侧门齿的原始人骨架，不独有偶。在山东胶县三里河、曲阜西夏侯、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侯县石山的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骸中，都有头骨人工变形、拨除侧门齿的骨架，这就雄辩地证实了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4千年前），亦即包括了三皇时代，由于生存的需要，已经于不自觉间产生了简单的外科手术，有了颅骨变形和拨齿的手术方法。出土的人骸，虽然没有文字说明，但它却真实地为我国外科学起源的时间，为我国外科医学史上最早的手术时间，为俞跗治病“割皮解肌”的可能性，为有关俞跗轶闻之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信的“人证”材料。

又如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山顶洞人”，已经使用了砾石石器和骨针，在山顶洞发现了一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圆滑，针尖锐利，针眼窄小，是挖制而成。这枚骨针尽管不是医用，而是山顶洞人缝制衣服的工具，但其工艺水平，反映了三、四万年前的原始人，已有能力磨制、刮挖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具，这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上佐证了在上古时代针砭治病、明堂论针的可信性。

考古发掘而获得的无文字说明的器物，对于研究整理上古时代中医学起源时期的文献，考察早期中医文献的源流有着重要的作用。从事中医文献研究应该重视地下发现的文物文字资料。

第二节 古文物与中医文献

从古文物在中医文献研究中的作用而言，可以把它概括为医药文物和佐证资料两类。

一、医药文物

医药文物是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历代沿传和发掘出土的有历史价值的器物。

建国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发掘出土的医药文物不断增多，为研究中医文献提供了

大量的实物证据。

长沙左家公战国墓葬出土的药秤、砝码；敦煌出土的军用药函木盖；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刘胜墓中的铜盆、金针、银针；淮安出土的汉代合金药罐；江苏江阴县出土的刀、针、剪、镊等外治医疗工具等（《文物》，1972年3期），种类颇多，年代交错，互资佐证，为各时期论述中医药发展概况的文献，出示了无庸置疑的证据。

解放前，在汉代石刻画像中，曾有捣药图，藉图可见汉代制药之盛，但仅限于据图联想。1955年南京博物馆展示了馆藏汉代铜捣桶，1958年长沙五里牌一号墓又出土一完整铜杵臼，臼径8.4厘米，高11.5厘米，杵长20.5厘米，古色斑斓，清晰可鉴，与南京捣桶印证，辅之以石刻画像，便可以实物推断出我国两千年前的制药水平了。

长沙出土的五代陶碾槽与轮，槽底刻有“天成四年五月五日造也”10字（《新中医杂志》，1978年3期）。天成四年是公元929年，五月五日乃端午日。乍看此物，可能只限于惊叹五代人的以陶制槽，铸轮的工艺之精，倘再结合古代药具多有竹剪、牙刀、铜刀、木杵、石臼、磁研钵之类而细玩，便能以之证古代文献所记端午制药、制药忌铁之习俗了。

二、佐证资料

研究中医文献的佐证资料，主要是指历代沿传保存下来，以及考古出土的器物。而本节所谈器物，又主要是刻有文字（兼括碑文），即有铭文（亦称金文）的器物。《说文解字·叙》云：“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鼎，为古代之炊器，彝，古代青铜器之通称，鼎彝，乃泛指青铜器。即得之于山川，可见在许慎时代已经有出土之古器。古铭器的出土，在隋唐史书上已有记载，赵宋之后，出现拓本，始兴其学，元明此学中辍。至清，随考据之学而复起转盛。

现在可资研究铭文的书籍有吕大防的《考古图》、《续图》及《释音》；王黼等人的《宣和博古图》；王休的《啸堂集古录》；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恩的《东观余论》；阮元的《积古斋彝器款识》；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杨树达的《金文说》。

铭器的文献价值，一可赖其于考察文字演化中而获得丰富史料；二可证早期文献所论之实，并补其轶逸。惜其传世和出土的铭器直记中医人事者，尚难目见。但只要我们在研究学习中自觉地把铭器作为中医文献的佐证资料，也不难从中觅出有用的材料。

如铭器中的尊、罍、壶、盃、觥、觥、觥、角、爵、斚等器，皆为酒器，从殷商时代即开始使用，其中斚为三足，两柱，一釜，圆口，平底，是温酒器。仅酒具出土的名目就如此之多，可知殷商至战国时期饮酒风隆，而且饮而必温，致有斚器。这在客观上就为酒之药用时间，酒醪愈病，提出了铭文佐证。

又如鬲为炊具，始用于新石器时代（《尔雅·释器》：“款足谓之鬲”，《汉书·郊祀志》：“空足曰鬲”，是知鬲似鼎而足中空，便于熟食。至殷商始制铜鬲，体为长方形，下有可开合之门，由门放入木炭。

常同鬲合为一器的甗，相当于今用蒸锅。分上下两部，上部叫甑，置食物；下部为鬲，放水。中间置一有十字孔或直线孔的铜片，叫箅。此器流行于殷商至战国时期。

从上述两器的工艺及使用情况分析，我国在殷商时代之前，煎煮烹调就已相当发展。这些材料从时间上提供了文献中记载“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素问·移精变气论》），伊尹“负鼎俎以滋味”（《史记·汤本纪》），善烹调，制汤液的逸事可信性。

除解放后出土铭器外，于上述介绍的历代之铭文著录中，也可撷拾出有用于中医文献研究的资料。

如《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记录的“行气玉佩铭”，原文如下：

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机）春在上，地几（机）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这段刻在十二面体小玉柱上的“行气”铭文，是叙述练作气功的行气方法。其意为：行气之要，着在深吸而使气得以积蓄，气得积蓄就能伸长而下沉丹田，气固于丹田之中就能萌生新气。如此循环之法，正合现在气功疗法中的循环一小周天、大周天之理。

学习《黄帝内经》中有关摄生之论，先秦诸子养生之学，参证于玉佩铭文，就可了解古人“吹响呼吸，吐故纳新”（《庄子·刻意篇》），呼吸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认识了。并有助于探索我国气功疗法之源始。

古文物，特别是有文字说明的古文物和铭器，多数是标明了器物制作之时，流行之期，使用之人，彼时史事，因而对于考证当时历史背景，验证相应理论可起有关文献起不到的作用。从事中医文献研究，应该把古文物材料纳入自己的知识范畴，作为佐证资料而予以必要的重视。

第三节 甲骨文的医用文献价值

一、甲骨文与甲骨文学

甲骨文是指甲骨文字。甲骨文学是考释研究甲骨文的学问。

自王懿荣发现收集甲骨文后，刘鹗将其得于王氏之手的甲骨文，选印为《铁云藏龟》，成为我国第一部汇集甲骨文资料的书。孙诒让又据以写成《契文举例》，陈个人考释意见，遂成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之作，使甲骨文于科研学术中占居一席。

继孙氏之后，罗振玉写成《殷墟书契》前后篇、续篇，《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倡为甲骨大家。王国维著《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与罗氏比肩，使甲骨文研究蔚成学风，被誉为罗王之学。截至解放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已近三百人，论著九百种。

建国后，学术界更加重视甲骨文研究，1961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甲骨文考释研究，专业队伍也逐年增加，先后出版了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研究》系列书，芟复去伪，确定甲骨文字约四千五百个，已认字占其数三分之一。

甲骨文学者重视墨拓，恢复原形，校对辨认，去伪存实，为中医文献研究者从中摘取医用文字，医用材料提供了可靠根据。

甲骨文是研究中医早期文献的第一手材料，甲骨文学，是中医文献工作者的助读助研资料。

二、医用甲骨文学举例

研究甲骨文医用字者，尚无专书，今就甲骨文著述论文中已定医用字举例如下：

𠄎（心），象人心脏的轮廓形。也省作𠄎有时倒为𠄎。

𠄎（骨），象骨架相支撑之形，左右小划，象骨节转折处突出形。又写作𠄎。后又作𠄎，加形符从肉，才写作骨。

𠄎（疾），也写作𠄎，𠄎象人，𠄎象床，全字象人卧床上。也写作𠄎、𠄎，后者象矢著𠄎

下，矢亦声，是会意兼形声字。𠂔在甲骨文中多数用作“急”意，少数用为疒病之疒。

𠂔，𠂔，𠂔（齒），象口内牙上下相错之形。甲骨文字中多有疒齒之占卜。

𠂔，𠂔，𠂔（腹），𠂔，象人，○，⊖象肚子，合为象人的肚子。卜辞中常有“王疾腹”和“疾腹”的记载。

𠂔（胸），𠂔，象人形，⊙，象胸内有心肺。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疾胸”之占只有一条。

𠂔（手），𠂔，象手指，𠂔象肘腕，合意象一只完整的手。

𠂔（项），𠂔，象人，𠂔，象人项的部位。

𠂔，𠂔（舌），𠂔，象人口，𠂔，象从口内伸出的舌。

𠂔（温），象人在浴盆中洗浴。洗浴之水当温，不宜冷热太过，因象温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从上述十例甲骨文字结构组成中可以看出，在殷商时期或殷代之前，人们对生理卫生、疾病成因就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一点足证甲骨文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中医文献形成时期的底蕴。

三、甲骨文学的医用文献价值

我们现在研究中医早期文献，大有两千年前孔子叹殷商文献失考之慨。建国以来，虽有出土文物、简帛等文献材料可资研究，但其中医用材料仅十之一二，难补措手。由于早期文献材料的匮乏，常使一些学者对于我国中医早期文献的研究，产生推断联想之争。致使中医的源起，医巫的关系，《内经》的年代等重大问题，因缺确证，尚无口碑之论。

近年来，甲骨文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古文献材料，与出土文物、简帛书籍互为补充，使中医早期文献的研究已有救缺补考之望。目前，我们中医文献研究队伍中，尚无专攻甲骨文学者，但我们可以于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中，搜求医用资料，开辟对于早期文献求证务实的研究途径。

利用甲骨文和甲骨文学研究成果，可以在考释中医古籍字词，校勘讹误，验证史实，确定早期中医文献典籍时代等课题中起重要作用。

胡厚宜《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2121片辞文是：“戊兔卜，旁贞，𠂔酒才疒，不从王古○贞，其从王古”。

𠂔是武丁时著名的臣僚，常从事祭祀征伐活动。酒，原卜中写作𠂔从水酉声。才，通在。从，训为随从；古，通故，训解为事。《左传》昭25年“昭伯问家故”，杜注云：“故，事也”，即此一例。这片甲骨辞文是贞卜𠂔因为饮酒而病，是否能继续随从王办事，还是不能随从王办事？这条辞文给今人以两点启示，第一，可知殷武丁时期已有酗酒之风，对于断定我国古代酿酒业产生的上限时间，进而断定酒之药用时间，大有裨益。第二，“𠂔酒才疒”，可译为𠂔因饮酒而在患病之中，可证殷人已经认识到醉酒可以导致疾病，藉此可以说明殷人对于某些疾病及其成因已有比较正确的分析和理解。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收一片意思完整的占辞，其文是：“庚戌卜，朕耳鸣，𠂔知于且庚，羊百𠂔□五十八”。辞意是：耳鸣是否不祥，有物作祟，祭羊百只，乞祐于先祖。耳鸣是病症的反映，非息神作祟而得，殷人崇神，误认其作祟，而问卜，不足为训，但是此占对于我们断定最早记载耳鸣的文献时间却是十分可贵的实物文字资料了。

耳鸣的记载，《内经》中已有。姚振宗辑《七略·数术略》佚文记云：“嚏，耳鸣裸占十六卷”，《汉书·艺文志》亦有此记载。以《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上限公元前475年记，甲骨此条所记大约要早于《内经》近九百年。”

目前, 中医文献研究队伍中, 尚无专攻甲骨文之学者,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弱点, 我们应尽快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方能更好的于甲文学的研究成果中, 搜求医用资料, 开辟早期文献求证务实研究的新途径。

第四节 中医文献的发展

中医文献的发展依赖于三个条件, 一是载体材料的更新; 二是我国目录校勘学术的发展; 三是中医自身理论实践的发展, 及其专著的出现。纵观中医文献学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把其发展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

一、中医典籍文献出现的时期

战国至汉代是中医典籍文献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文献载体材料的决定, 书籍的形式是简册、缣帛、金石。汉以后出现了纸, 又有卷子和写本。

除出土的简帛医书之外, 《汉书·艺文志》方技类记载医学方技书目共三十六种, 八百六十八卷, 又二十篇; 简册医书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宓戏子杂道》二十篇。可见汉以前, 简帛医书已有相当的数量。

今见最早仅《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是这些传世典籍文献的代表。因为我们目见的出土简帛医书, 或失全, 或单篇, 如《内经》、《本草》巨著者, 尚待发掘。汉哀帝(公元前五年)时, 刘向父子把汉代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整理, 得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其中有不少是医书。这种受命编次书目的工作, 激发了汉代学者著书立说的积极性, 中医典籍文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在此时期问世的。

鉴于载体材料及文字产生演变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典籍文献具有如下二个特点:

1. 著述形式多为问答体。从一般文献学上论, 先秦时期多记言文, 即说理文。其形式是从语录体发展而为专题论文的。语言上具有用词简练、富于内容的特点, 《内经·素问》即是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式的论著。翻开全卷《素问》, 无一不是问答成文, 说理寓于答辞之中, 既是答问, 又何以视为一篇说理文。目前出土的简帛医书也有很多是问答成文的语录体, 即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也还可见问答体的特点。

2. 著述内容多为条文化。问答形式为文, 促成了简帛医书内容的条文化。因为一问一答, 不能所答非所问, 因此每一答文都有独立成文的特点, 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先秦医书内容的条文化特点。这一特点可在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简帛医文中得到验证。

在中医典籍文献的产生时期, 除中医典籍专著外, 有关中医理论的文论还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著中。又由于中医典籍文献具有问答式和条文化两个特点, 所以一种理论, 一个概念, 往往重现于几篇文论中, 这就使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文献时, 必须掌握一种学习方法, 即必须运用文献学知识合读诸家之说, 摘录各篇之言, 合并同类同论文字, 而后升华出某种概念和理论。没有如此的资料汇集, 不经过集各家之说、诸篇之论后的比较分析, 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当时中医文献中论及的概念和理论, 也就不可能正确分析认识中医文献的起源和发展。

二、中医文献全面发展的时期

从魏晋南北朝到宋金元时代, 伴随着校勘注释的产生发展, 中医文献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除纸与雕板术发展的条件外, 下述三个因素促进了中医文献的发展:

第一, 社会的重视。西晋时期, 秘书监荀勖对秘书阁藏书作了一次整理, 得书二万九千